

智力有多元 “差生”也能获诺奖

八旬教授获大奖

英国科学家约翰·戈登开创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细胞繁殖的新的培育方法，而且开创了成熟细胞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干细胞和克隆研究的先河。

他30岁时进行的这项研究，当他将近80岁时，命运使他与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。

老师眼中的笨学生

然而，这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中学时代却被老师认定是一个“不可救药”的差生。在英国的伊登公学读中学时，他在这一届250个学生中成绩倒数第一。尽管成绩不好，但他勇敢地宣称自己想当一名生物学家。

但是，老师非但不鼓励他，反而对他泼了一大盆冰冷的水。老师居然一本正经地对戈登写了一个评语，评语说，“我相信戈登想成为科学家，但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，这个想法很荒谬，他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，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。对于他个人及想教导他的人，这根本是浪费时间”。

这个评语偏偏传到了戈登手里，他一直小心地保留着这个评语。他把老师的挖苦当作激励自己上进的动力。直到他获得诺贝尔奖，记者们接二连三地到他办公室采访他的时候，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看到这个触目惊心的老师评语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

老师的评语一度使戈登认为自己的科学家之梦难以成真，他曾转向研读英国古典文学，并申请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。但是，生物学之梦仍然是他心头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。他想回到生物学的轨道上来。经过努力，后来大学同意他攻读动物学。

这个曾经被老师沉重判定为不能成才的笨学生戈登，1960年获得了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后，戈登又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。再后来，他又返回牛津大学动物系从事研究。这个“笨学生”，从学士到博士，再到博士后，再到教授，再到研究所所长，一步一步地攀登着，一步一步地前进着，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。

老师的评语没有成为戈登泄气、逃避的理由，反而成为鞭策和激励他不断努力的动力。他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老师的苦心。他对生物浓浓的兴趣，引导他锲而不舍地实现自己的生物学理想。

难兄难弟同时获奖

说来也巧，同时获奖的山中伸弥与戈登一样，同样是一名差生。

山中伸弥小时候喜欢拆机器，但会拆却不会装。他把机器玩具拆了就装不拢了，为此父亲没有少骂他。读高中时，他兴趣变了，醉心于学柔道。他想将来有一天能参加奥运会，拿一块金牌回家。为了学柔道，他一共十一次骨折。

他后来读了医。但是，他动手能力差，动手术总要比别的医生多费一倍时间。他知道自己不适宜当临床医生，更不适宜做手术，于是他从事研究。这个差生，后来居然也拿到了诺贝尔奖。

辩证看待差生

戈登和山中伸弥两个差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要辩证地看待学



约翰·戈登

生的成绩，要辩证地看待差生。

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曾经提出多元智力论。他认为，每个人都存在着多种智力，例如语言能力、律动能力、逻辑能力、空间能力、音乐能力等，任何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优势。每个人都不能占有全部智力项的优势，总是有所弱，有所强。戈登和山中伸弥在某一方面都有明显的智力弱势，其实，他们在另一方面也具备自己的智力优势。只是这些优势不明显、不被重视罢了。

戈登的老师用那么一种眼光看待成绩不好的学生，差一点把一颗诺贝尔奖的优良种子毁掉，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深思考。

《科学生活》2016.12.30文/朱长超

鲁迅与丰子恺译书“撞车”之后

《苦闷的象征》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(1880—1923)的文艺理论著作，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。

鲁迅着手翻译完，1925年3月，作为《未名丛刊》之一出版。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丰子恺翻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出版。

当时，人们很是好奇，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，哪一本更好？丰子恺说：“他（指鲁迅）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。”读者季小波（丰子恺的学生，与鲁迅也有交往）认为，丰子恺的译本“既通俗易懂，又富有文采”，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，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，佶屈聱牙。他为此给鲁迅写了

一封信，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、丰译的同一节、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，在比较后指出：鲁迅在翻译上不如丰子恺。此外，信中还谈到直译、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。几天后，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，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，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，还在信中幽默地说：“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，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。”一番话，表现出鲁迅为人谦逊和坦诚的品质。

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，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。个中道理很易理解，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，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，是个名

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，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。后来，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，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爱护，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，以感谢鲁迅对他在文学起步阶段的扶持。

1927年11月27日，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，谈到中译本《苦闷的象征》同时在中国出现时，鲁迅认为，一部外国著作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同时存在，以取此之长，补彼之短。鲁迅的这一态度不仅消除了丰子恺内心的顾虑，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而且传为一则文坛佳话。

《北京青年报》2017.1.2文/杜学峰

恽代英的对联：既有才又有情

我们所知道的恽代英，除了他轰轰烈烈的革命事迹外，还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。一是他的文章写得很好,二是他的演说能力特别强。所以郭沫若后来深有感触地说,“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，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人，不知道恽代英，没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”。

阅读恽代英日记，偶然发现他作的几副对联，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。

一是挽妻联。念汝端庄聪明，豪爽似男儿，婉柔似室女。好诗书，通情理，志道德，原谓将来，龟勉同心，用全力造福社会，造福家庭。岂意汝如许年华，竟因这一块肉，舍予而去；

自此丁零寂寞，承欢失贤助，治内失良妻。思往事，睹旧容，抚遗婴，只看目前，张皇万状，更无法处置丧礼，处置庶务。回忆此三载姻缘，难禁我万行泪，怆然以悲。

这副挽联写得情深意切悲怆感人。恽代英与妻子婚后感情甚笃，妻子一朝仙逝，恽代英心中之痛实难言说。挽联写出了妻子的贤惠，写出了夫妻二人对未来的规划，更道出了自己深沉的悼亡之情。

二是挽弟联。问天何心？他廿年烟样光阴，既拙既痴还短命；一死亦罢！愿来生再作兄弟，无灾无病到白头。

恽代英的这副挽联，既客观地写出

了弟弟生前痛苦生活的事实，又饱含深情，充满了难舍难分的兄弟之情。

第三副对联是恽代英为新生活而作的。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。这副对联构画出了他们心目中新生活的美好愿景，那就是人人平等自由，个个在新的社会尽心尽力。这样美好的憧憬带有一种大同社会的意味，是生活在当时纷扰时代的恽代英所期盼的。

三副对联，不论是写夫妻兄弟私情，还是描绘社会蓝图，都情真意切，蕴意深远，读来让人深思。

《文史博览·文史》2016年第12期文/周二中

博学幽默的潘光旦

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、优生学家，曾任教于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等，是清华四大哲人之一，博学而又幽默。

1914年，潘光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参加跳高不慎摔伤了右腿，后因感染不得不截肢，从此落下残疾。但他从不忌讳自己的残疾，甚至还常拿自己的残疾“开玩笑”。

在清华园的时候，有一次下雪，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，以为是什么小动物，跟

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。小男孩说：“我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，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，原来是你啊！”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当笑话讲给家人听，还夸奖那个小男孩有寻根究底的劲头。

一次，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演讲，当讲到孔子时，他说：“对于孔老夫子，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。”说着，他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，更正道：“讲错了，应该是四体投地。”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



白糖“助力”冼星海呵成《黄河大合唱》

1938年11月，冼星海和钱韵玲以旅行结婚的名义，从武汉来到延安。在这里，他创作了著名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据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回忆：“1939年初，光未然在山西打游击的时候坠马受伤，到延安治疗，我父亲听说后，走了十几里山路看望这位老朋友。光未然在病床上，用5天时间就写完一首长诗，在之后的窑洞朗诵会上，光未然朗诵完，我父亲霍地站起来，把歌词一把抓到手里说：我有把握写好它！”

冼星海从3月26日开始谱曲。钱韵玲每天给他熬红枣汤，光未然知道他喜欢吃甜的，给他买了两斤白糖放在桌上，他随时抓起一把吃，用了6天6夜写完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《天津日报》2016.12.19

不以自己标准要求别人

20世纪30年代末，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一次新生入园时，热心的刘文典主动替负责内务的老师为学生们安排宿舍，还帮他们设计床位和各种物品的摆放，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第二天就有学生反映，他们宿舍的一名室友要求重新摆放床位。刘文典闻讯后解释说，宿舍狭长，床铺自东朝西摆放，既有利于通风又有效利用了空间。两张书桌并排放在窗户下，采光很好，很适合读书写字。然而，要求重新摆放床位的学生却低头不语，似乎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刘文典气得直摇头，索性甩袖而去。

当天下午，刘文典又来到宿舍，不仅同意了那名同学提出的要求，还向他道了歉。这让大家不解。

“我自认为没有什么设计比目前的更合理。”刘文典笑着说,“但当我回去查看学生档案时才发现，这名学生是维吾尔族人，而在维吾尔族的习俗中，最忌讳的就是睡觉时头东脚西。再合理的标准也不能凌驾于别人的习惯和风俗之上呀！”

《发明与创新》文/乔凯凯

中国江苏网 2017.1.5 文/洪德斌